

DANGDAIJINGJIXUEXILIE
CONGSHU ●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美] 罗纳德·I·麦金农著
- 周庭煜 尹翔硕 陈中亚译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DANGDAI JINGJIXUE XILIE CONGSHU

陈昕主编

责任编辑 范蔚文
封面装帧 宋珍妮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

周庭煜 尹翔硕 陈中亚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公司排版
上海联合科教文印刷厂印刷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插页:2 字数:239,000

印数:1—5,000

ISBN 7—208—02462—6/F·504

定价:19.00 元

DANGDAI JINGJI XUE XILIE CONGSHU

经济市场化的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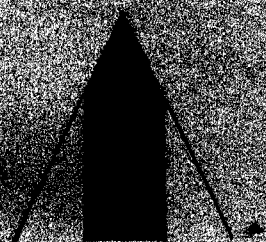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

● [美] 罗纳德·I·麦金农著

● 周庭煜 尹伟强 陈中坚译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名著

F1204



出版前言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

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丛书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同年,他的同事爱德华·肖教授也出版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位经济学家在这两本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陈观烈先生认为,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打破了前人只就真实变量论经济发展的传统,较早地突出了金融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2)反对把针对现代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来,而力图立足于后一类国家的国情来创立新的理论并由此导出新的政策主张;(3)对发掘发展中国家内部资金潜力抱乐观态度,主张这些国家应努力“自助”;(4)

经济发展要消除资本报酬率在不同部门、地区和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差异(见《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7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这种变革又因种种初始情况的不同而显得多姿多彩: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各国采取了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方式,并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宏观经济仍然保持得非常稳定,价格上涨率较低,金融深化进展迅速”。而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前苏联和东欧的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大爆炸”式的经济自由化,结果引起了产生的急剧下降和经常性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了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种后果甚至成了前苏联解体的部分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麦金农教授于 1991 年出版了他的这本新著——《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并于 1993 年修订再版。

同样是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为何效果却迥然不同呢?麦金农教授认为,对于实行经济市场化而言,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如何确定最优次序的问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如何排次序的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政府不能、也许也不该同时实行所有的市场化措施。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虽因各种类型经济的初始条件不同而有所区别,但却存在着一些共同特点。这些共同特点正是这本《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一以贯之的主题。如能正确地安排好次序,就能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若弄错了次序,就会导致金融和经济灾难。正如麦金农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指出的:“对一个高度受抑制的经济

实行市场化,犹如在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二)

应该如何安排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呢?麦金农教授认为,第一要务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财政控制应该优先于金融自由化。

为确保财政控制,首先应限制政府的直接支出,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较小的份额,之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而适当增加。若政府支出不受控制,财政经常出现赤字,那么,在国内资本市场阙如以致无法向社会公众推销政府债券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就会被迫过度发行基础货币以弥补公共部门的赤字。即使国内有资本市场可资利用,但若举债过度,则会陷入严重的国内债务危机,80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南美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为确保政府支出的来源同时又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有能力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然而又是较低的税收。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内税收部门,建立一种有管理的税收制度,以保证政府能筹措到足够的财政收入,避免通货膨胀。在这种税收机构和税收制度建立之前,大部分工业资产和自然资源最好仍然由政府所有,作为国库的收入来源,否则就很难避免严重的通货膨胀。

麦金农先生指出,在紧缩的财政控制到位,物价水平得到稳定,财政赤字被消除以后,政府就可以考虑实行市场化的第二步,即开放国内资本市场。

然而,为避免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崩溃,放松对银行和其

他金融机构管制的步伐必须与政府在总体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适应,而不能单兵突进。银行系统永远必须受到管制,以维护整个支付机制的安全运作。由于私人货币中介机构的经营中存在着道德公害问题,若对商业银行实行私人所有或私人控制,就会使改革进程归于失败。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从高度集中的、大一统的国有银行起步的。麦金农认为,对它们来说,在市场化的开始阶段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硬化货币与信贷系统,使实际利率为正,强制长期负债企业偿还债务,严格限制信贷流动,直至价格水平稳定。麦金农还指出,新获得自由的企业可以学习中国民营企业的榜样,主要依靠自筹资金,依靠从非货币性金融资源借款,也可扩大对企业的股权参与。

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成功地自由化以后,政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从事汇率自由化的改革了。

在汇率自由化改革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次序正确、步调适当的问题。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应大大地早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首先,应统一所有经常项目的汇率,避免多重汇率,使全部进出口交易都能以相同的有效汇价进行,以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率。其次,应恰当地制定贸易政策,逐步取消扭曲性的配额和其他的直接行政控制,代之以显性的、逐步降低的关税。

麦金农明确指出,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是经济市场化次序的最后阶段。只有在国内借贷能按均衡利率进行,通货膨胀受到明显抑制以致无需贬低汇率时,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才算是成熟了。“过早地取消对外资流入的汇率控制会导致未经批准的资本外逃或无偿还保证的外债堆积,或两者兼而

有之。”

(三)

值得一提的是,麦金农先生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经济自由化的次序》的修订了的第二版中,他以“中国1978—1992年的金融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对俄罗斯和东欧的含义”为题,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作了论述,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作者指出,截至本书写作的1993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具有持续时间最长、但直到现在才得到较好证明的经济市场化经验。在80年代初的农业成功的基础上,中国轻工业中的非国有部分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迅速发展。到了80年代末,迅速增长的出口成了增长的发动机。如果仅用俄罗斯和东欧的标准来衡量,随着1979年以后有组织地放开价格,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保持得非常稳定,价格上涨率较低,金融深化进展迅速,实际金融增长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果与麦金农先生所开列的经济市场化次序能否相互印证呢?

作者认为,在财政方面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然而又是暂时的例外,而中国的利率政策和逐步的对外贸易改革则是与第1章概括的经济市场化最优次序相一致的。在市场化改革的进展过程中,中国政府也经历了公共收入的急剧下降,这种下降在性质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收入下降是相似的。然而,在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中国却保持着实际金融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这与麦金农先生所总结的经济

市场化最优次序是相悖的。作者将这一事实称为“中国之谜”，并对这个“谜”作出了四点解释：(1)中国政府首先使农业这样的领域实行市场化，这些领域后来的生产率增长很迅速；(2)政府对工业和农业中新近市场化的“非国有”部门实行了很硬的预算约束，很少给予银行信贷；(3)对传统的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了价格控制，并给予强制的金融支持；(4)对居民的储蓄存款确定了正的实际利率，因此而产生的储蓄和金融资产存量的巨额增长使得自由化了的部门能够为自己融资，也使政府能够为自己的财政赤字和暮气沉沉的国有企业的赤字融资。

作者在论述中国政府在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保持金融增长和宏观稳定时曾经指出，这是一个暂时的例外，言下之意是，中国不可能长期地同时维持这两个方面。这一点被作者不幸而言中。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致政府不得不暂时牺牲经济增长的目标而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实行了全面的紧缩。我国的经验似乎从反面说明，麦金农先生所归纳的经济市场化最优次序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未被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所证伪。许多学者已提出了改革财政体制，扩大税基，稳定地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以应付通货膨胀的建议。随着税基的扩大，国有企业的税负就可大大减轻，从而增强发展潜力，增加政府未来的收入，便于政府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均衡，而不必挪用银行资金来增加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物品的供给。

综上所述，麦金农教授的这部新著，确实是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官员和经济学界人士一读的好书。目前，我国正

处在九五计划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将完成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历史重任。在完成这两个历史性转变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资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外贸体制及汇率制度与国际惯例的接轨,等等。本书的翻译出版,对我们迎接这些挑战无疑提供了大有裨益的参考。然而也必须指出,作者毕竟是一位西方经济学家,对我国国情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他提出的政策主张难免会有隔靴搔痒之感。因此,我们不能全盘照搬他提出的经济市场化次序,而应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探索 and 实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理论。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的周庭煜同志一直热心于经济学的翻译事业,近年来,已主译或参加翻译了《振兴于混乱之上》、《现代国际商务大词典》、《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多部经济学著作。他和其他几位同志合作翻译的这本《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一书,既忠实于原著,又简洁流畅,精神可嘉,故乐为之序。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

王华庆博士

1996年7月



前言

当 安德斯·里奇特、弗农·拉坦和保罗·舒尔茨约我为享有巨大影响的“约翰·霍普金斯发展研究系列丛书”写作时,我的初始想法是把 1973 年《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出版以来我在金融和外贸自由化领域所撰写的文章汇编成册。在欠发达国家开放其受抑制的国内资本市场的过程中,关于对价格水平和汇率实行金融管制的问题,我们得到了哪些深刻的教训呢?毕竟,我先前的著作以及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爱德华·肖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也是写于 1973 年)已经找出并命名了我们所谓的“金融抑制”。为了在贫困国家取代政府对信用流动和稀缺资本配置的控制,这一术语现已成了老生常谈,以证明以正的实际利率发生着大量借贷行为的自由化资本市场的合理性。

但是,书中这一初始的、相当有局限性的观念,已被东欧和东亚社会主义诸国的迅速事变所超越。前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采用了市场机制。事实上,这一变化仍然震撼着1985年以前就已开始职业生涯的每一个人的头脑。当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布了在前苏联进行改革即经济重建的需要。但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受到中国早些时候的农业成就的强烈影响。这些成就始于1979年,庞大的农村公社被分裂成大体上以市场为依托的小农承包户——即所谓的家庭责任制。1986年,越南和老挝也采用了同中国早先的经验相类似的“新经济机制”。到1990年柏林墙倒塌时,所有东欧小国都开始了某种形式的经济市场化。

由此,在1991年出本书的第一版时就已产生了改写的必要。从政府对产出和价格的指令性控制网入手,对于确定从社会主义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最优市场化次序而言,有哪些主要的技术经济问题呢?本书的前十章以我在过去12年里所撰写的文章为基础,提炼了一些以前属欠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开放其国内资本市场和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的斗争中采取了高度的干涉主义态度。

在特地为本书撰写的第11章和第12章中,上述提炼出的经验被用于东欧和亚洲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过渡问题。由此,我们的研究中心更多地置于在可能延续十年或更长时间的过渡时期内确保金融控制和宏观经济稳定,较少地置于重新界定产权(这本身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也较少地置于某些对国有工业资产和银行系统迅速实行私有化的应急性计划。

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显著的转向,但是,社会主义国

家不仅在实现符合要求的过渡方面遇到了各种困难,而且,它们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采取了较为渐进的政策改革方式。因此,就需要用新的两章来探讨这些差异。在篇幅扩展了的本版中,第13章“中国1978—1992年的金融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对俄罗斯和东欧的含义”和第14章“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渐进自由化和迅速自由化:对不同模型的总结性评论”,构成了重大而必要的补充。尽管中国人仍在以各种方式保护其陈旧的国有工业,但他们也设法在工业和农业的已实现自由化的部门中确立显著的高增长。然而,进入90年代,亚洲国家的成功被其因政府收入急剧下降而带来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所冲淡了。

也许更多地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非经济上的设计,东欧和前苏联的大多数国家都因袭了“大爆炸”式的经济自由化——由1990年1月波兰的大爆炸领头。价格的迅速放开和中央计划型投入配置的中止伴随突然开放对硬通货国家的更自由的贸易。与经济互助委员会(1991年初解体)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衰减了。但是,由于受传统的贸易格局被打破的影响,东欧的经济自由化一开始引起了产出的急剧下降和经常的爆炸性通货膨胀。俄罗斯1992年1月在陈旧的国有重工业部门对价格和投入配置的仓促放开似乎产生了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1993年本书写作时,实际产出进一步下降,还有近乎恶性的通货膨胀。

那些主要关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所承受的剧痛的读者很可能希望从第1章给出的自由化的一般次序入手,然后迅速进入第11、第12和第13章对“代表性”社会主义国家的详尽分析,再到对自由化外贸的不同模式的结论结束。然

而,对于确定银行准备要求或者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确定汇率这类特殊的技术性问题,他们可以回溯前几章从欠发达国家的经历中找出的教训。

但是,学习经济发展的学生最好按照顺序读。前几章以1973年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一书建立的分析框架为基础,但并不取代这一框架,那本书仍然值得先读一下。然而,自1973年以来,人们已学到很多东西,既有正面的,表现为对确实成功地实行了市场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丰厚回报;也有反面的,来自于弄错了市场化次序的那些国家。确实,对一个高度受抑制的经济实行市场化,犹如在雷区行进: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另一方面,从不顾金融挫折而持之以恒地推行市场化和自由贸易战略中得到的收益可能是巨大的。在智利1973年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中,70年代末的不适当的外汇、工资和国内银行管制政策导致了80年代初的金融崩溃,第4章和第6章对此作了证明。这种金融崩溃和急剧的产出下降似乎危及该国经济开放的基本承诺。然而,智利并未退而转向国内,而是坚持了基本的自由贸易立场。到了90年代,智利很高的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增长率,使人不禁联想起韩国和中国台湾以及亚洲诸小虎,它们的金融政策也将在随后的篇幅中时常论及。

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具有持续时间最长、但直到现在才得到较好证明的经济市场化经验。在80年代初的农业成功的基础上,中国轻工业中的非国有部分从80年代中期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的迅速发展。到了80年代末,迅速增长的出口成了增长的发动机。如果仅用东欧的标准来衡量,随着